

喀拉拉系列之一

印度的鄉村圖書館 ——公共生活空間的開拓

劉健芝

印度，給人的印象，是貧窮落後。

即便你沒有到過印度，你的腦海裡浮現的影像，也許是沙塵滾滾的街上黑瘦的小孩伸出骯髒小手向人乞討；在棚屋前面衣衫襤褸的老婦漠然呆坐；街角處一群男人無聊地打發時間。如果追問，這些印象怎樣來的？你也許說不出來，也許會說是電視、雜誌上看到的。反正，貧窮、落後、骯髒、慵懶、卑屈、無望，幾乎是互通的，印度的人均國民產值在 2001 年只有 450 美元，只及我們中國的一半。似乎確實無誤的數字，表述了似乎不容置疑的貧窮落後。

我們中國要向印度學習嗎？相信很少人會這樣想。從五四運動提出「科學、民主」的口號，到新中國建立後要「追英趕美」大躍進，到改革開放時期的「四個現代化」，我們想學習的榜樣，是現代化工業化的北美西歐。印度，不入我們的眼簾。

今天，步入北京的國貿大廈、上海的梅龍鎮大樓，時髦舶來商品琳琅滿目，雲石臺階高雅潔淨，與巴黎紐約的百貨商場無異。城市中上層的生活方式，可說緊追北美西歐了。但是，有多大比例的人口在享受著現代化的甜美果實呢？

如果說百年歷史見證了農村凋蔽困厄，如果說今天中國面對的三農問題相當嚴峻，如果說我們要探求鄉村建設以及社會整體發展的多種道路，那麼，我們要放下成見和幻象，把視野從北美西歐轉向以往不屑一顧的「第三世界」，尋找適合中國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發展模式。

位於印度西南角的喀拉拉邦，論「貧窮」程度居世界前列，十多年前比全球排第十的窮國更窮，人均收入比印度平均水準低。但是，它卻有非常寶貴的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經驗，可供我們參考。

1956 年，印度三個西南地區合併成為喀拉拉邦，全邦說同一語言——馬拉亞拉姆語，是「山地語」的意思。喀邦人口 3 千 3 百萬，農村人口占百分之 80，有 990 個鄉，人口密度在全國排第二，每平方公里有 750 人。一個驚人的數字：全邦有 9 千多間圖書館，1 萬 2 千多間閱覽室。其中，隸屬於「喀拉拉圖書館議會」的圖書館有 5 千多間，分為三類：甲類有圖書 2 萬 5 千冊以上，乙類有 1 萬 5 千冊以上，丙類有 5 千冊以上。三類圖書館的比例是 2:3:5。這就是說，每個鄉大約有人口 2 萬 5 千人，圖書館 8 間，閱覽室 10 間。

單是鄉村圖書館的數位，已羨煞國內的友人。今年 9 月，我到晏陽初當年進行鄉村建設運動的定縣訪問。今日的定州市，是縣級市，人口 120 萬。坐計程車去市圖書館，司機不知道圖書館位置。館內冷冷清清，藏書不到三萬冊，每年購書刊經費 3 千元，十多年來未添置一本新書，只訂閱一些報刊，每週借出的圖書僅十來冊。據說，國內不少縣市公共圖書館情況相若。

這種天淵之別，讓我感慨之餘，很想追問，喀邦的鄉村圖書館是怎樣走出來的，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裡又扮演什麼角色。今年 10 月初到喀邦參加研討會，特地詢問鄉村圖書館的情況。

原來，鄉村圖書館在喀邦已有 60 多年的歷史。在 40 年代，還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潘力卡（PN Panicker）推廣圖書館運動，每一個鄉村成立一個圖書館和一個閱覽室。1945 年 9 月，圖書館聯會正式註冊，後來成為「喀拉拉圖書館議會」，有 47 個創辦成員。1989 年，喀邦議會通過議案，正式承認它為喀邦的公共圖書館，邦和地方政府每年撥款添置圖書，管理人員大多是義務的。

有這麼多圖書館，可以想像，喀邦的出版事業十分蓬勃。1945 年，12 間出版社集資 120 盧比（今天，一元人民幣約相當五個盧比），成立「知識出版合作社」，1949 年與「民族書店」合併，之後的 25 年，是出版界黃金時期，從 1960 年到 1975 年，該合作社每天出版一本書！類似的出版合作社有十多家，但規模較小。

圖書館林立、出版業蓬勃，意義不簡單是數量上的可觀。這些數字讓我們窺見喀邦的社會和政治變遷，也讓我們想像喀邦鄉村的文化生活是怎樣的。在 20 世紀 40 年代，工人、農民、賤民等運動，是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重要部分，圖書館運動在民智開發和知識累積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時代變化，圖書館的作用也有改變。以往，圖書館和閱覽室是鄉民聚集的場所，從早上七時到半夜，有鄉民來讀報、評論時事、高談闊論。一般的圖書館，會有 3-5 份馬拉亞拉姆語報章，1-2 份英語報章，幾份週刊。週刊由個別鄉民捐贈，報章由圖書館訂購。近年來，喀邦有三千多份報刊，每個鄉有鄉報派發到每戶，約百分之 70 的家庭自訂報刊，於是較少人到圖書館讀報，這些地方便少了以往的熱烈討論了。

圖書館如果只是書架和書報，那麼，在電子媒介日益發達的今天，它會逐漸被淘汰；在自己家裡或在網吧上網不就行了？但是，圖書館如果是知識文化傳播和再生產的支點，它便會生意盎然。

喀邦的幾千個鄉村圖書館，並非全都活躍，但積極推廣科技知識、文化活動的還是不少。在安那庫林區（Ernakulam），VNKPS 圖書館是甲類圖書館，有 55 年歷史，藏書 2 萬冊，訂閱 8 份報章 30 份期刊。位於三個鄉中間，這個圖書館有 1 千名會員，三分之一是女性，另外有 300 名兒童會員。圖書館是三層大樓，面積 280 平方米，有閱覽室、會議室、康樂室、兒童圖書室。一名婦女圖書館員負責流動圖書室，每週為 200 個農戶送上書籍。圖書館經常與各類合作社和學術、農

科機構合辦工作坊、培訓班，內容涉及農業、畜牧、能源、母嬰健康等；圖書館自辦刊物，鼓勵會員寫作投稿並組織辯論和研討。館址的活動多姿多采，有徵文比賽、話劇創作表演、體育競技活動、草藥醫治班等。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我們小時候讀書，父母老師會這樣激勵我們；這說法反映了民間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大致離不開對個人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追求。喀邦的民間熱心者的圖書館活動，卻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想像，是尋求群體發展、移風易俗，特別是讓占人口多數的弱勢社群有凝聚發展的空間。

在首府特里凡德瑯區（Trivandrum）的柏連卡馬拉鄉（Peringamala），鄉村圖書館作為中心，推行培訓課程。首府的「發展研究學院」CDS 派出研究員來柏鄉，培訓當地的大學畢業生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社區發展銀行業務和政府福利政策等，然後由這些青年志願者各人領導一個 20 名婦女組成的小組，協助小組提出發展項目，申請撥款，然後執行。專案的設計，是致力於讓每個小組發展出有領導才能的人，以後不用志願者幫助也可自行運作。

圖書館同時設立資訊中心，邀請醫生、工程師、地區發展官員等參與，協助小組成員挖井、養磨菇、種菜、改善食水供應、搞小型水利設施等。每週的婦女小組聚會，讓婦女暢所欲言，加強自信心。一名婦女小組成員蘇達珊那（Sudarshana）說：「以前，我不敢在公眾場合說話，但現在，我們會在村民大會上坦率地講意見。」另一婦女莎吉達（Sajitha）說：「通過圖書館計畫，我們發現集體努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雖然數額不大。」

瓦利庫努鄉(Vallikunnu)位於馬拉浦南區(Malappuram)，是回教徒聚居的地方，婦女很少參加公共活動，1999 年 4 月搞了一個流動圖書室，將全鄉分為五個社區，由五名志願者分管，每人每月津貼 500 盧比；她們逐家逐戶推廣圖書借閱。閱讀習慣普及後，制度簡化，在每個社區設定點借閱室。9 個月內，婦女借閱圖書冊數 2 萬 5 千本。文化上的變化悄悄地展開。

青少年的成長也是關注點。在庫馬羅貢鄉(Kumarakom)，1995 年開始設立社區讀書室，約 50 戶的學童為一組，每天早上七時聚集，做半小時眼部操，然後溫習一小時才上學，晚上從 7 時半到 9 時再作溫習。眼部操的音樂和動作，是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一名成員到中國訪問後學來的。每個小組由一名志願青年做導師，協助功課上的困難，也輔導青少年的成長。

前年暑假帶 20 名香港學生自費到喀邦訪問，安排他們在村民家裡住宿兩三周。一名學生興奮地告訴我，她在小小的鄉村圖書館，發現有巴西著名平民教育學家保羅·費爾(Paulo Freire)的書。這本書她在修我的課時讀過。

物質條件匱乏的喀邦，竟是鄉村圖書館林立。的確，可怕的不是物質上的匱乏，而是精神文化上的匱乏。喀邦的捲煙工人的故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印度土產

的手捲煙，號稱「窮人煙」，約六釐米長。80年代中期，印度手捲煙煙民有2億5千萬，每分鐘吸煙一百萬支。這個行業有約六百萬全職和兼職工人。工人的生財工具只要一把剪刀、一個竹盆、靈巧的手、專注的精神。每天，幫工把煙葉磨碎篩過曬乾，捲煙工人先把樹葉浸濕，剪成小塊，然後把煙葉平鋪樹葉上，快速卷成錐狀，上面用手指壓平，下面用線紮好。工人一天可卷6百至2千支煙，入息微薄，卷一千支煙是15盧比，相當於3元人民幣。一般到45歲，手指皮磨得很薄，不能再做下去。

這是低賤的行業，辛勞的活。但是，喀邦一些捲煙工人，幾十年來有一個習慣，至今保留下來。他們忙於生計，也有人不識字，於是幾千工人分成30-40人一組，每組由工人輪流專責朗讀報紙和書本，讓他們一邊工作，一邊聽讀報念書，一邊討論。每天晚上，各人把一些捲煙交給讀報工人，讓他有同等收入。

寧可減少百分之三的收入，也要聽讀報。這是窮人的選擇。他們沒有因為窮、物質匱乏，而變得精神世界被壓縮到只關心基本生存的利益問題。「窮」，不是他們的選擇，但追求積極參與的精神世界，卻是他們的選擇，也是在於他們的選擇。這是他們活的尊嚴，尊嚴的活。

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 ——社區建設的樹人工程

劉健芝

「科學」，是五四運動的一面大旗，表徵了現代文明進步。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面對西方強國入侵，先是「堅船利炮」「師夷之技以制夷」，到梁啟超康有為的維新時期，已經提出不限於學技術，而是全盤學習西方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文化。「科學」，百年以來，與「救亡」「強國」分不開，與現代化工業化軍事化分不開。

「科學」，戴著幾乎神聖的光環，走進了現代詞典，走進了現代社會生活。比起五四運動另一面大旗「民主」，「科學」有不同際遇。「民主是什麼」這個問題，從來爭議不休，各家有各見，於是，我們看到一大串名詞——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新民主、人民民主、美國式民主、亞洲四小龍式民主……但是，「科學」卻可逍遙自在，享受它的崇高一統地位，似乎世界上、歷史上只有一種大家都公認的「科學」。

但是，細想一下，有威力的工具會被有權勢者企圖操控，「科學」又怎會例外？平民百姓不能說享受不到科學的好處，電視、電話、摩托車、拖拉機，在我們的生活和生產領域隨處可見。科技在現代化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對日常生活影響越廣泛和深入，社會分化便越益嚴重：一面是掌握科技知識的少數但強勢者，一面是生活不得不越來越依賴科技在社會的應用的多數但相對弱勢者。而農村、農民，相對於城市和城市居民，可說是弱勢中的弱勢。

然而，科學就不能為廣大民眾所用嗎？民眾便不能積極參與討論和決定科技如何發展如何運用才對它們有利、才更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自主、自信、自尊嗎？不是的，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的經驗，可供我們參考。

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發展得最好的是在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已有 40 年歷史。印度多個邦有不同的民眾科學運動，獨立運作但組成聯網，名叫「全印度民眾科學聯網」AIPSN，（簡稱「全印科聯」），定期交流經驗。

「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簡稱「喀科運」），在 1996 年名聞全球，因為它取得了被號稱為另類諾貝爾獎的「優秀民生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這個獎項每年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夕在瑞典頒發，表揚在全球對民生最有建設性貢獻的實踐經驗。「優秀民生獎」讚揚「喀科運」「促進了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喀科運」其中一項驕人成就，是在 1989-91 年，用三年時間動員十數萬義工在全邦進行民

間掃盲運動，1991 年喀邦宣佈成為全民識字邦，至今男、女識字率都高踞百分之 95 以上。印度獨立後，國家耗費不菲搞掃盲運動，成績差強人意，後來借助「喀科運」掃盲經驗，國家只出一點錢補助書籍粉筆，「全印科聯」特設教育組織 BGVS，在全國動員八百萬義工，接受培訓後每人負責替十人掃盲，為期一年，成績斐然。關於掃盲運動的詳情，將另文介紹。

柏勒覓雅然（M P Parameswaran），朋友簡稱為 MP，是「喀科運」也是「全印科聯」的核心成員。他解釋運動的要義，在於他們相信科學有利於人類社會進步；科技提供了條件讓億萬人的貧窮疾病可以根除，讓明天比今天更好；科技應該而且可以成為億萬窮人改變貧苦命運的武器。

運動是人組成的。看看 MP 的個人故事，也許可以對民眾科學運動的理念和實踐有多點瞭解。MP 是原子能科學家，1935 年出生。1957 年 10 月，他和朋友聽電臺新聞，說蘇聯發射了第一個人造衛星，超前美國。他非常雀躍，嚮往到蘇聯留學，學科技來抗衡霸道的美國。於是自修俄文，到了蘇聯。在那裡，他既欣賞社會為所有人提供生活保障、教育、醫療、就業，也反思共產主義是否應追求資本主義所追求的物質富饒與揮霍，是否能擺脫資本主義的精神空虛與貪婪。

回國後，MP 不願意像大部分科學家一樣，為政府研究武器，為財團謀取暴利。他加入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要讓科學知識服務民眾。與他一起的，初期是十多名科學家，後來運動發展，各種階層人士包括教師、主婦、青年、技工、醫生和各種政黨背景人士參加進來，今天，「喀科運」成員有四、五萬人。「科學」被定義為廣義的知識，包括生產知識、生活知識；這個知識不是割裂的，不是精英知識界壟斷的，而是民間智慧通過專業者與草根生活者的磨合生產的。

有人會問：民眾科學，聽來與一般科學沒有很大差別，不就是科技人員不為政府、財團打工，改為下鄉；不就是科技不作軍事發展，改為民用？現代社會普通市民都在享受科技成果，國內鄉鎮都有科技人員，這算不算「民眾科學」？

不錯，如果看「喀科運」或「全印科聯」從事的工作，似乎與國內情況相若。舉例來說，「喀科運」有一個專門發展民用科技的研究中心 IRTC，研究和推廣多種農村適用科技。例如無煙省柴灶，既可提高燒柴的效能，間接保護林木，也可防範柴烟中毒（世界衛生組織說全球每年有 210 萬婦女兒童死于柴烟中毒，當然絕大部分發生在第三世界）；例如低成本房屋，就地取材分析泥土特質燒制耐用實磚空心磚，配合建築設計，讓空氣流通、光綫充足、起居舒適，既能節省建材，也節省日常生活的能源消耗；又例如椰油香皂，由於椰子價格近年大幅下跌，嚴重打擊本地經濟，椰子沒有銷路，「喀科運」於是研製農戶能掌握的技術，自製椰油香皂，取代進口香皂。其它科研項目包括如何減少細菌滋生的食用水蓄水池、燒柴燃燒率達百分之 95 以上的發電機、省電的日光管起動器、煮飯保暖盒、太陽能、沼氣、小型水利發電、綜合農畜模式、豬種改良、草藥栽種應用等等。最近幾年，更開展一個全邦水流域管理的大型專案，與村民一起討論。

上述例子也許不顯眼，因為比起現代大工業，它們看上去不過是農村適用技術罷了，而且，這類技術國內也十分普遍。究竟「喀科運」有甚麼特色？

經過幾年觀察聆聽讀資料，訪談各階層人士，包括「喀科運」核心成員、義工、農村婦女、科技人員、政府官員、不同政黨人士等，我的理解是，「喀科運」四十年的實踐所演繹的「民眾科學」理念，並非僅是技術層次，亦即不能約化為農村適用技術。農村適用技術可以說是一種手段，一種內容，但支撐「喀科運」的，是一種哲學，一種比較可取的社會發展模式，一種樹人工程。

甘地的名言「讓家家戶戶有一部手織布機」，概括了他的理想社會模式：人們應追求簡樸充實的生活而這生活是盡可能自給自足的。面對追求全球化、現代化的主流發展觀，甘地的主張似乎迂腐可笑。但常識也告訴我們，全球人口若以美國模式為榜樣，並有能力消耗同樣的能源，地球的石油、天然氣會在一年半之內耗盡。僅一個數字可說明問題：美國的能源耗用量相當於人均每年 8 噸石油，中國人均是 0.66 噸，相差 12 倍（1998 年數字）。美國模式不可存續——這是願意看的人都能看到的。對於身為被剝奪者的第三世界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村民眾）來說，尋覓可存續生計便要另闢蹊徑。

把「喀科運」的實踐拼湊起來，便逐漸呈現一個圖像：它不懈地嘗試推動用本地原料、能源生產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減少對外來原料、產品的需求，促進本地社區經濟的發展。重看他們的科研重點——太陽能、沼氣、小型水利發電——是能源開發；省柴灶、保暖盒、省電起動器——是能源節約；香皂、土磚——是本地材料運用；蓄水池、水流域管理、綜合農畜模式、豬種改良、草藥——都導向相對自足的、講求生態的本地經濟。

但「喀科運」最為重要的，也許是它的樹人哲學與實踐。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義大利著名哲學家葛蘭西說，人人都是哲學家，要創造條件讓哲學家成長。「喀科運」的信念是，人人都是科學家，要創造條件讓科學家成長。科學是知識，特別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專家學者壟斷之後再「灌輸」給民眾的知識，往往是脫離生活、躲在實驗室裡研究出來的知識，反映的是不懂節約、妄求不斷操控、改造大自然甚至宇宙的欲望。美其名是造福人類，但歷史讓我們看到這樣的科技發展釋放了無窮擴張的欲望，造就了現代戰爭、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散。我們見到原來是希望造福人類的成果，反過來吞噬文明，加強社會分化，使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被推向邊緣。

民眾科學的知識，是通過每個人對日常生活中的天文地理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現象的觀察、理解以及適應、介入、改造來生產的。它不是孤獨的追求，而是集體互動的學習和創造，因此，它不會讓所謂知識自封成為一個王國，它要考慮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造成的道德和政治問題，即民眾科學是民主的知識，是本源於集體生活的知識。

因此，「喀科運」在成立初期，用喀邦的馬拉亞拉姆語書寫與推廣科普讀物；之後，在全邦舉辦大量科普班、科普講座、觀星興趣組、少年科學家學習營、教科書和課程改革試驗，等等。它推行的社區項目，無論是水利發電還是土磚建築，都不會是幾名水利專家或建築師來策劃推行，而是盡可能動員全社區參與，包括商討社區有甚麼需求、不同需求之間有甚麼矛盾差異，認識專案的目標、技術原理和可能成果，動員社區不同階層實際參與；專案不僅尋求成果由多數人享用，而且通過參與來學習、教育、提升。1996年3月，我參觀一個社區正策劃的小型水利發電項目，多名義務的年輕男女科技人員以及社區一大批少年婦女男士，陪同我攀上小山峰，十幾歲的孩子和三十余歲的家庭主婦，指手劃腳爭相解釋在甚麼地方建壩，工程會怎樣進行，他們將會有甚麼得益。他們的興奮和自豪的容貌，猶在眼前。

民眾科學，讓科學知識服務普羅大眾，讓普羅大眾掌握科學知識、改善生活、增加自信自尊。人人都是科學家。

印度的掃盲運動 ——農村貧困者自主力的開發

劉健芝

甚麼是現代國家的國民？我們會想到國家賦予他們公民權利，他們對國家承擔公民義務，也就是說，現代國民應有能力掌握現代知識與技能，所以，識字率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準的其中一個指標。可是，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奮力掃盲卻依然徒勞；國民的「落後」被看成為既是國家落後的結果，也是國家落後的原因。

在印度，情況最惡劣的比哈爾邦，識字率是 47.53%(2001)；印度全國平均水準是 65.38%；但西南的喀拉拉邦，卻在十多年前——1991 年 4 月——便已經成為全民識字邦。這個不平凡的數字背後，有一個不平凡的掃盲故事。

1962 年，一批科學家走在一起，要普及科學知識，讓民眾能掌握對他們有用的技能。首先，他們把英語科普讀物翻譯成喀邦語言馬拉亞拉姆語。「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簡稱「喀科運」）就這樣誕生了。經過十多年的努力，1978 年在全國 990 個鄉之中的 600 個鄉，逐步成立了「農村科學論壇」，目的是與村民一起嘗試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喀科運」的構想，是每個村莊有兩三名「喀科運」的活躍成員，對當地問題有具體細緻的瞭解，帶動村民建設社區。

經過幾年實踐，「喀科運」發現，幾名活躍成員可以起帶頭作用，但社區整體發展必須靠民眾積極參與，尤其是最底層的人、最邊緣的人不能被遺棄。1986 年，「喀科運」調整策略，將重點放在推動全民識字，讓識字的人不只學懂看書讀報，還培養能力掌握知識，創造知識，以改造他們生存的環境。「喀科運」決議在五年內令喀邦全民識字，於是籌畫一個行動綱領，送交印度國家教育部。試點建議在十七萬人口的安那庫林區（Ernakulam）進行。國家掃盲委員會在 1988 年審批撥款。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因為「喀科運」從未肩負這麼大的專案，國家掃盲委員會也從未將這類工作交給一個民間志願團體來推行。

「喀科運」的計畫，是在該區動員一萬五千名志願者進行為期一年的掃盲活動。這種龐大的動員史無前例。上街示威、罷工抗議之類的行動是印度公民慣常見到的，但大量義工動員做社會公益事業，則出乎政治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意料。1989 年試點工作開始進行，同時，「喀科運」組織文藝演出隊，巡迴到全邦 1600 多個地點作宣傳，印製、售賣大量小冊子，宣揚與掃盲、發展、自治相關的理念。

1990 年 2 月，安那庫林區宣佈成為全印度第一個全民識字區，參與的義工有 2

萬 3 千名。試驗非常成功，旋即在全邦開展，動員 30 萬志願者；1991 年 4 月，喀邦成為全民識字邦。國家掃盲委員會非常讚賞這個成績，邀請「喀科運」和「全印度民眾科學聯網」（「全印科聯」）協助在全國推行掃盲運動。為此，「全印科聯」專門成立一個教育機構，名為「知識與智慧促進會」（BGVS），在接著的幾年，在全國多個邦約 400 個區推行掃盲運動，報名參與掃盲運動的學員有 1 億 2 千萬人，報名的義工有 1 千萬人，實際完成比例甚高。

數位固然可觀，但掃盲運動的真義不在量，而在質。「喀科運」的出發點，並不把文盲的村民看成愚昧無知、缺乏教養。相反，他們相信民眾之間流傳寶貴的民間智慧，人人有學習能力、應變能力。現代社會的大小事務總離不開文字，民眾識字，能更有自信參與，能更好地譜寫自己的歷史。

這個出發點非常重要，與一般的現代化、都市化社會的主流觀點迥異；它不把農民看成落後可恥，看成現代化的絆腳石、包袱，而是正視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被犧牲被邊緣化的遭遇，對非西方國家在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統治下沒有甚麼選擇餘地而接受的西方發展模式，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它看到這樣的發展是狂妄的，滿足的只是少數得益者偏執的欲望，但地球上大部分的生命卻被嚴重破壞，從包裹大氣層的臭氧層到海洋深處到地下水，都受到不可逆轉的污染破壞，同時，社會分化和地區衝突也隨著所謂科技發達文明進步而日益嚴重，越來越看不到解決的辦法。所以有必要抗衡這種狂妄。

這個問題涉及的不單單是農民的出路；全社會的出路也在農民身上。因此，他們要協助農民在自身、在社區、在本地，尋找力量尋找資源，改變生活中不如意不合理之處，扭轉狂妄自大、不懂節制的欲望所推動的發展之路。他們的發展觀以民為本，以大多數人利益為依歸。

帶著這種理念推行的掃盲運動，重點是個人及社區的長遠變化。在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內洛爾區（Nellore），一些農村婦女參加掃盲班，每週聚會。掃盲班不少教材是學員表達興趣和需要後，與教員合編或改寫；在一地編寫的教材會在各地流傳。這就是說，掃盲班並沒有呆板地規定學員學懂甚麼字，才算符合「脫盲」標準，而是讓教材和學習靈活配合學員的處境。

內洛爾區的掃盲運動在 1990 年 1 月宣佈開展，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宣傳推廣——主辦者組織歌舞創作、街頭劇團、家訪等等，到各村各戶動員教員和學員志願參與。1991 年 1 月，掃盲班正式上課。在杜巴貢德村（Dubagunta），學員有三本教材，其中一本有一個《絲姐的故事》，說的是絲姐的丈夫酗酒，她無法改變丈夫的惡習，自殺了。杜巴貢德村的掃盲班婦女學員，讀到這個故事時百感交集，紛紛訴說她們自己的故事。59 歲的玉婷（Uddin）說，她的丈夫 14 年前被酒精奪命，死前經常酒醉鬧事。在這個貧窮的農村，自然環境惡劣，農作物經常被颱風摧毀，失業普遍，更糟糕的是，僅有的一點錢，常被男人拿去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後虐待妻兒。

掃盲班的婦女，訴說各自的不幸，有的說，丈夫打她有了新的理由，就是她這麼大歲數，還要甚麼脫盲識字，是瘋了。婦女們商議後，決意村內不留一個酒鬼，於是行動起來。她們的故事迅速傳到其它村落，也很快寫入掃盲讀本；新的故事叫《如果婦女們團結起來》。這一課說：「這不是虛構的故事，這是我們上掃盲夜課的婦女的成就。我們的村叫杜巴貢德村。我們用血汗賺取工資，從土裡生產金子，但有甚麼用？錢都花在土酒上，我們的男人沒有錢買酒，就賣掉家裡的米、油、任何東西……我們的日子很難過。後來我們讀到絲姐的故事，我們開始想，弄死她的是甚麼……第二天，我們幾百人走到村口，截停一輛酒車，叫商人把酒倒掉，我們一人拿出一盧比賠償他的損失。他嚇怕了。就是這樣，那天以後，再沒有滴酒進村……我們現在有力量，也有信心。我們知道只有通過教育，我們才能取得這次勝利。」

在之後的村民自治選舉中，玉婷被選上村委主任，這在重男輕女的農村，是不簡單的。如星火燎原，各地婦女紛紛起來反對土酒。在 1992 年的民間反酒運動壓力下，邦政府在 1993 年宣佈全面禁酒。在裡貢達伯度村（Leguntapadu），一名政府官員應邀參加反酒集會時，問婦女能否一天儲蓄一盧比。一名婦女上前，把一盧比放入他手裡，其它婦女紛紛效法。官員問，為甚麼把錢給我，為甚麼你們不組成小組，把儲蓄集起來，自己管理？儲蓄運動從這個村開始發展，超過 20 萬名婦女自發組織了婦女儲蓄小組，接著逐漸有能力以集體名義向銀行或信用社貸款。

印度有許多世界銀行、聯合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等搞的小額貸款項目，但前述例子主要不同之處，是這些自發的婦女小組，是經過掃盲運動一段時期的個人能力和集體意識的培育之後，從婦女自身面對的日常問題出發，尋求解決。掌握知識、增加自信、維護尊嚴，是內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反土酒運動和婦女儲蓄小組運動，是由掃盲運動引發的。喀拉拉邦帶頭開展的掃盲運動，最可貴的是它是一場影響深遠的鄉村建設運動。讓全民成為有知有識之士，這個目標是全社會接受的；運動實際開展之時，也捲入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政府官員、不同黨派人士和科技專才，充當義務教員，在與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學員共處的期間，打破隔膜，消除誤解，增進相互的認識。掃盲運動推進了社會各階層的整合和社區發展動力的開發。也因此，掃盲運動並不以民眾脫盲而結束，而是全社區成員進一步捲入對社區本地資源的瞭解、探測、開發。鄉村建設運動不僅有了本地骨幹人才帶頭，有了廣大民眾參與，也有了凝聚建設運動的公理人心和人際網路。掃盲運動奠下基石，讓民間自發的社區規劃行動可以開展，也讓 1996 年史無前例的喀拉拉邦「人民計畫運動」得以推行。

這裡的「發展」，綜合了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它首先是一場文化運動，一場人的提升的運動。

民眾科學運動的“資源譜圖”

——心和身的參與

劉健芝

人人都是哲學家——義大利的葛蘭西如是說。人人都是科學家——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如是說。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人的潛能，也是人自主存活的條件。

如何讓有可能發生的，變成即將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我們常常談論“民主”，但往往是從制度安排的形式上的層面來看參與的問題，或把通俗但空泛的“當家作主”的口號作為理解“民主”的“常識”，這樣只是抽象地看待參與的問題，猶如只是從遠距離看到了軀體的位置，而不管個別軀體有獨特的靈魂。換句話說，是忘了“參與”是人的實踐活動，群體的存活是由個體組成的。參與是心身的活動、心身的能力的發揮和培育；所謂心，可說是葛蘭西所說的哲學家的能力，而身，可說是民眾科學運動所說的科學家的能力。

“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簡稱“喀科運”)，深信社區的發展，要社區全部人參與，尤其要最底層的人參與。1991年4月，人口三千萬、農村人口占八成的喀拉拉邦，進行了由民間策動的全民識字運動，宣佈成為全民識字邦。識字運動不是形式上讓窮人脫盲，而是讓他們有機會有能力參與社區建設。

識字運動不以傳統教學方式進行，而是動員本地有文化的人，義務一人為十人開班，每週兩三次聚會，持續一年。學習的材料，與學員日常生活和社區問題有關。識字運動完成之時，社區具備了兩大資源：一方面凝聚了一批願意做公益事業的社區精英，他們與底層人建立了友誼和信任，也增加了對底層人處境的瞭解和同情；另一方面，社會的底層人在識字班上交流對社區問題和自身處境的看法，形成了某些共識；這些共識不是刻意去追求的，也不為政黨利益或政府政策服務，但零碎地表達了普通人對生活的看法和期盼。

“喀科運”是一個民間運動，沒有財力物力在全邦990個鄉進行後續工作，於是選擇五個鄉做試點，推進鄉村社區建設。它首先進行一個全面的“資源譜圖”

(resource mapping)，簡單說，就是了解本鄉的各種資源，譜製成圖，再在這基礎上籌畫建設方案。

驟眼看來，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特別。要建一座樓房，當然要勘察地形土質；要挖一個水井，當然要探測地下水深度。但是，“喀科運”獨特之處，在於這些工作並非只由技術人員來做，而是全社區參與。參與並不流於形式化，而是一個實際的學習、承擔、付出的過程，效益由大家分享。

在中國，不乏類似“資源譜圖”的調研工作，著名的例子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等二百名博士下鄉在河北定縣做鄉建之初，李景漢等人進行了為期五、六年的調研。洋洋八百多頁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詳列地形、土壤、人口、農耕、地租、借貸、行政、教育、衛生、宗教、民俗等與村民生活相關的各個方面，其方法的嚴謹和觀察的細微，令人佩服，例如，有歷任縣長的任期、背景，有農民食品的材料做法，有小孩遊戲細節，有村民趨吉避凶的傳說。所譜的圖，涵蓋鄉民生活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信仰各層面，作為基礎制訂鄉村建設的各個方面，如改良豬種，改善水利灌溉，改善衛生環境，推行婦女教育、平民教育，革除紮腳、童養媳陋習等等。

因此，譜圖是一個瞭解現狀從而改變現狀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喀科運”的核心領袖沒有聽過晏陽初、梁漱溟的故事，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談建設，便先要看鄉村的現狀，看問題的複雜性與相關性，看村民的需要和欲望，讓紛雜的需要和欲望有機會碰撞、衝擊、篩汰，讓大家從既有的資源中開發出新條件新路向。

讓我們看看“喀科運”怎樣做“資源譜圖”。

安那庫林區（Ernakulam）是其中一個試點。柏拉沙教授（M.K.Prasad）負責領導生物多樣性譜圖，覆蓋以下範圍：草藥、植物、蔬菜、果樹、木材、經濟作物、飼料、牲畜、魚、害蟲等等的種類、地點、規模；收成和農耕方式的變化；本地個人和社群如何介入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使用及保護；哪些是共有的本地知識來使用生物多樣性的資源，哪些是部分人佔有的知識，例如某些醫術；本地人如何理解有甚麼公眾參與管治資源的途徑。譜圖工作同時包括建立地方資訊聯網，明確標示資訊來自哪些個人或社群；提供生物多樣性資源的貿易量、價格等資訊；保護本地資源和本地知識不被商人私有化。

從上面列出的各項工作，可見譜圖不僅是把動、植物的資料記下，而是涉及多個層面——從歷史的變遷，看農耕、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從資訊、知識的掌握，看社區的人脈和商脈對資源的共用或壟斷；從社區如何理解對資源的管治，探討民主使用和保護資源的可能性。

正如其它譜圖工作一樣，這項工作並非由柏拉沙教授領導一個專家小組去完成。這項工作毫無疑問需要科技專家參與，但前提是尊重及協助社群保存本身的知識，有效而可持續地使用社群的活資源，同時抗衡時代大趨勢——本國以至外國有財勢者覬覦和掠奪這些資源。這些例子實在太多了——珍貴的草藥、禽鳥，從當地人手中賤價收購，一輪旋風式掠奪之後，生物多樣性瀕危的警號響起，生態已無可挽回地被破壞，而當地人存活的條件更為惡劣，陷入更無望的貧困。

由於譜圖不是政府、財團或學術專家要掌控資源的分佈，而是鄉村建設民間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它帶有如下特色：本地社群不是被套取知識資訊的物件，而是直接參與其中的主角，在過程中，他們學習和思考——更好地瞭解本地資源的現

狀，瞭解歷史變遷的因素，有系統地整理和共同擁有既有的資源知識，同時探討如何更好地使用和保護資源。

柏拉沙教授領導的安那庫林區生物多樣性的譜圖工作，在 1997-99 年進行，期間，一萬人參與。工作初期，是進行大量的培訓，義工大多是本地的學生和失業青年，他們學習如何系統地、詳盡地收集資料，與村內各種人群交談，整理資料冊、報告。這個過程，培訓了一大批本地年青人，不僅懂得收集資料、處理資訊、進行訪談，而且全面和深入地瞭解本地的歷史和現狀，並萌生對前景的看法。他們本身就是寶貴的本地資源，是本鄉建設的主力軍。

譜圖工作的成果，記錄在釘裝好的一冊一冊的資料冊上。有傳統手工業者（陶器、鐵器、紡織、草席編織等）的分佈和消失趨勢；動植物的種類和分佈（他們發現該區曾種植了 314 種米，害蟲有 51 種；也繪畫了野草和害蟲的蔓延分佈圖）；在市場法則下某些資源如何被濫用破壞；當地人對發展和現代生活的訴求、想像，以及這些想法如何受到社會和經濟勢力的左右，又如何影響生物多樣性資源的破壞或保存；集體討論如何由社區共有資源、疏解矛盾衝突、共用收益。

生物多樣性譜圖不過是一個例子。同時期，集中在五個鄉進行的譜圖，涉及生產、消費、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教育、醫療衛生、水資源管理、婦女地位、各種社會資源的運用等等。譜圖工作有四大支點。一是鄰里互助互望小組，是村民直接參與的基層自治組織；每個鄰里小組約二十來戶，自由組合，不是行政單位，但卻是村、鄉自治組織的活細胞。二是經濟上的自助組織、合作組織、消費者協會。三是技術支援組，核心成員是本地的科技人員、專業人才、農民精英、工匠、知識青年、公務員和退休人士，他們也會協助聯繫外界技術、資金、人才。四是有別於主流發展觀的文化和倫理，而譜圖工作通過“集體夢想”來讓矛盾展現，讓未來理想的圖景出現。

“集體夢想”之所以重要，因為它不把村民的期盼和欲求簡單地或是浪漫吹捧、或是嗤之以鼻。今天，沒有一個農村不受全球化的外來力量影響，物欲和金錢如磁石般吸引著人們，原來較為樸素的倫理關係和價值取向被擠到一旁，而無法實現的追求又帶來忿恨怨懣。一旦鄉土成為落後的象徵的話，它不再被視為滋潤生命、歷史的樂土，可以不足惜地被拋棄在後面，啞然看著現代化快車在地平線上消失；趕不上快車的人，被迫遺憾地苟活在快車載走了寶貴資源、留下塵土飛揚的荒地上。

“喀科運”策劃的“集體夢想”，不壓抑村民的欲望盼頭，各種願望自由表達，但同時，通過集體審視本村本鄉本國的歷史進程以及不同群體在這個進程中的得失，作出批判、反思。配合“集體夢想”的，是本地歷史的資料搜集（例如口述史）和整理，其中有民間傳說、民謠、民風的再讀。歷史的回顧，引領出對未來社會圖像的想像。之後，是問：我們怎樣可以走到大家都樂於生活其中的社會？怎樣用心用腦用手創造自己的未來？

馬達卡塔那鄉（Madakkathara）有四千多戶，“集體夢想”有二千人參與，很多人提出與“就業”相關的夢想，於是，技術支援組與當地村民一起，譜圖瞭解農業狀況、生產、消費欲望，發現本鄉 40% 土地用於種椰子樹，占勞動力 30%；18% 土地用於種稻，占勞動力 60%。他們繼而策劃改良椰樹的生產和使用，把種植椰樹面積減少三分之一，加種蔬菜、香蕉、樹薯，但改良椰樹品種，改善育養方式；椰樹總數從 12.5 萬株減為 10 萬株，但每株產值從 30-35 盧比增至 80-100 盧比，同時開發一系列椰樹產品，包括椰奶、椰油、椰皂、椰棕產品等，一方面增加就業，另一方面滿足本地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集體夢想”以提高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條件為主要考慮，產品的市場主要是本地市場，一方面減少對全球化不穩定因素的依賴，同時提高本地人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質素。

李景漢當年做社會調查的心得，是如何使一般老百姓接受、相信甚至歡迎他的調查，達到積極幫忙合作的程度。“喀科運”主要不同之處，是老百姓在專家協助下，自己瞭解問題、發掘問題、尋求適合本地生態資源技術條件來發展的道路。這是以參與、以承擔、以學習為本的民眾“當家作主”。

要讓“當家作主”的口號不至於淪為壓抑民眾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來參與的能力，那麼，“當家作主”作為引子，應可觸發大家齊來討論“當家作主”涉及的理念（哲學）和技術（科學）問題，並檢討這個通俗說法背著的歷史包袱（例如家長式的管治及以“家”為名的排外文化和做法），從而展開開放的互相學習的過程，反復探索“當家作主”依據的是甚麼理念、準則、價值，如何處理“多數”（強勢）和“少數”（弱勢）的關係，如何把根植于文化、歷史和現實的排他傾向轉化，讓不同的生活和價值取向所共存的時空成為互相容納學習的共同參與的時空。

如果制度上的形式問題不是只限于少數精英或知識份子之間的討論，而是大眾自主參與的討論，即這些討論已經是群體中的個人的實踐活動的話，我們便不用害怕這些討論會遠離人們的生活實踐，會困于抽象的精英知識份子的獨白。忘記了參與是心身的實踐，不但是流於形式主義的知識份子的問題，也是以通俗為名的反智習慣的盲點。

對自主參與的肯定，是對人人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能力的肯定。

「人民計畫運動」 ——自信和尊嚴滋長的土壤

劉健芝

1996 年 8 月 17 日，是喀拉拉邦馬拉亞拉姆年第 1171 年的元旦，也是全邦「人民計畫運動」正式啟動的日子。這個涉及 3 千 3 百萬人口參與的「運動」，並沒有引起國際傳媒的關注，也沒有引起印度全國的觸目，但是，我認為，它是西曆二十世紀終結前一次了不起的民主實驗，讓我們看到二十一世紀的曙光——以參與、承擔、學習為本的民眾「當家作主」。

如果說「民主」按慣常的理解，是政治上普選出各級議會代表的話，印度可算是民主大國。印度 1947 年立國之後，公民每五年有兩次投票機會，一次選邦議會代表，另一次選全國國會代表。在喀邦，1957 年舉行第一次邦選舉，「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CPI (M)（簡稱「印共馬」）領導的「左翼民主聯盟」LDF（簡稱「左盟」）贏得選舉，成為全球第一個通過普選上臺執政的共產黨政府。在以後的大選中，「左盟」與它的對手——印度國大黨領導的「統一民主聯盟」UDF（簡稱「統盟」）——輪流勝出（每次都是幾個百分點之差），每隔五年上臺下臺，成為喀邦有趣的政治民主景觀。

我與喀邦友人戲言：你們太有政治智慧了，利用印度的政治民主制度，每隔五年把選票投給在野黨，讓執政黨下臺，造成兩大黨派不得不重視選民的意願，為贏取民意不斷革新。友人解釋說：選舉有很多偶然因素，選民難以整體地主觀製造這個結果；「左盟」和「統盟」都有固定的、相若的百分之四十多的選民支持，於是一小批中間游離分子便能左右大局，而他們似乎有一個特點——總是不滿現狀，不滿執政者的表現。四十多年來這個投票模式，突顯了喀邦政治民主的優點缺點：優點是兩大黨派要順應民意、收買人心，所以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大膽實驗；缺點是社會生活層面滲透了兩方的對壘，一方推動的實驗難以持續發展，因為對方會拆臺，消解其政績。

從 1995 年開始，印度公民擁有第三張選票——選鄉議會代表。印度 1992 年修憲，第 73、74 修訂條例賦予鄉議會更大權力，使之成為地方自治機構。1994 年，喀邦根據國家憲法訂定「喀邦鄉鎮議會法」，翌年進行鄉、鎮議會代表民主普選。

1996 年的邦選舉，「左盟」勝出，旋即推行它的競選諾言：將全邦財政預算的 18-20%撥交鄉、鎮的地方議會直接支配運用。整個社會即時熱鬧起來。

喀邦的財政預算分為兩大部分——經常支出和發展專案經費，各占一半；「左盟」

政府把後者的 35-40%交由鄉、鎮議會直接運用，數額相等於每年約 100 億盧比，即約 18 億人民幣（以下數額全折算為人民幣），而 1996 年之前，撥歸鄉、鎮議會使用的經費只有 3 千多萬元。舉一個鄉為例。在庫馬羅貢鄉，人口 2 萬 2 千人，鄉議會有 10 席；1995 年鄉議會支配的經費只有 15 萬元，但 1996 年之後，可支配的經費大大增加。在 2000-01 年，庫鄉鄉政府的收入包括 100 萬元發展項目經費直接撥款，400 萬元邦政府經常支出撥款（以支付公務員和醫療、農技人員工資，社會福利如農業工人退休金、孕婦食物津貼等），70 萬元鄉政府獲授權收取的稅款用以支付 150 名教師的工資，27 萬元邦政府和中央政府撥下來的農業發展基金，另有 120 萬元合作銀行的貸款用以興建公共汽車總站和商場。

「左盟」政府在全邦推行的「人民計畫運動」，震撼之處在於它讓鄉、鎮地方議會管理大筆金錢，擁有實權，而且讓大批公務員聽命于地方議會。固然，官僚體系不是一時之間可以改變過來，怠工、破壞的舉措很多，但是，它開啟了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就是讓社會的民眾學習做主人，公務員還原為公僕。

這個過程絕對不可能是由上而下的過程，「人民計畫運動」也絕對不是「左盟」由上而下地策動的仁政。「左盟」之所以把「人民計畫運動」納為政綱一部份，是因為「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KSSP（簡稱「喀科運」）長期在農村社區培育民眾自主參與的能力，也就是人人作為哲學家 and 科學家的能力。「喀科運」繼識字運動和資源譜圖之後，在幾個鄉組織「鄉發展協會」，每一個村選派男女村民代表各一名，本鄉活躍的所有政黨（不論大小）各派代表一名，政府部門派出代表，專業技術人員也有代表。這個類似鄉議會的民間組織，商討並制訂本鄉未來十五年的全面發展規劃，動員各階層、各黨派人士志願參與建設社區。它兼蓄並收，既有長遠發展目標，又有短期工作項目。這種相容的、積極參與的民主特質，不是由金權主導的「西方」精英民主制度可以媲美的。它帶有一種在中國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操，但這情操不僅僅體現在幾個「知識份子」身上（儘管他們發揮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是滲透在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鄉發展協會」完全是民間自發組成的，超越了對抗性的政黨政治，而且在沒有政府或者基金會資助之下，發掘本地資源（資源譜圖工作奠定了基礎），依靠自身的能力來發展。這種制訂本鄉十五年民間規劃的做法，被「左盟」欣賞並採用為競選政綱。

如果沒有「喀科運」的實踐經驗，「人民計畫運動」不可能開展；而「左盟」的政府行為，又把民主進程大力推前。邦政府新修訂的鄉、鎮地方自治法，規定鄉之下成立村自治組織，每年法定召開四次村大會；鄉議會不能直接使用發展專案經費，必須由村大會提出專案方案，提交鄉議會會同專家小組審批；所有檔、受益人名單、專案詳情和數額、鄉議會收支帳目，都要公開，任何人有權查閱和複印。

1996 年 8—9 月在全邦召開的村大會，有 200 萬人參加，即每個村大會平均有 180

人參加，占選民的 11.4%，四戶有一戶參與。這種熱情幾乎史無前例，但參加的人並不是湊熱鬧，而是為一種真實的驅動力推動。

在村大會上，大家七嘴八舌，說出個人的或本村的需要，試圖提出各種專案方案。庫鄉是「喀科運」長期工作的據點，「喀科運」的骨幹成員提出，政府賦予村大會法定權力，是地方自治的基層單位，有效地把權力從鄉一級下放到村一級。但是，村人口有二千多人，如果成年人都參加村大會，人多不好討論，不如 40-50 戶組成鄰里小組，更能讓每個人直接參與，改善生活的各個層面。

在「喀科運」推動下，全邦 990 個鄉，約有 200 個有村民自願組成鄰里小組，小組討論本地的特殊需要，訂定各專案方案的優先次序，評審計畫的執行情況，決定誰是撥款受益人（這常常是村民的爭執點）。每個鄰里小組選派代表，組成村代表會，成為村日常事務的執行者，例如排解紛爭，安排文化活動、學生課餘活動，辦醫療室、儲蓄小組等等。這就是說，村的日常事務由基層選派的代表執行，而全村選出的代表，則出席鄉議會，協商各村之間共同或歧異的需求和利益。

「喀科運」正努力爭取邦議會立法，把鄰里小組定為村民民主參與公共生活的基層單位，在法律上承認民間已經存在的事實，並讓它成為普遍的實踐。

「人民計畫運動」這個大膽的嘗試，建基於每個普通人對美好生活的渴求，對自身能力的提升。運動在 97-99 年興建了 10 萬間房屋、24 萬個廁所、5 萬口井、1 萬 7 千多個公眾水龍頭、8 千多公里道路，清洗了 1 萬 6 千個池塘，把 30 萬英畝土地改為耕地。實地訪問，看到卡拉庫林鄉幾乎人人有房住，家家有廁所；以往要從其它邦進口牛奶、米、菜，但「人民計畫運動」撥款支持養乳牛，廢激素飼料，培植本地種子，牛奶產量增長了 30%，本鄉消費後還剩餘 15 萬公升外銷。在另一個鄉，技術人員協助在沙地種菜，據說產值達 3 千多萬元。

上述數位不過讓我們窺見運動的規模。但是，運動最可貴的，始終是它提供了條件，讓每個普通人活得有自信、有尊嚴，活得豐富、充實。生活離不開社會生活，離不開在特定社會領域活動的群體關係；沒有群體的認同和鼓勵，自信和尊嚴是很難建立起來的。「人民計畫運動」能為社會生活的參與提供場地，讓人們有積極參與的心，通過建立豐富多元的社群關係，使互相認同和鼓勵的力量不斷滋長，讓大家互相之間不同之處成為創建更豐富更充實的群體關係的推動力，而不是製造矛盾的分化力量。唯有這樣，自信和尊嚴才能持久，才能越益充盈。

從興建衛生間到建立社會清廉

劉健芝

非典型肺炎肆虐，對我們是當頭棒喝。多少年了，我們習慣了把眼光放在國民收入增長、個人存款額、股市指數上面。來一個“非典”，我們赫然發現，我們的衛生條件、醫療服務多麼不足，更嚴重的是，我們竟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本末倒置，忘記了幸福不是有多大迭的鈔票，而是身心的健康。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我們的目光，也許應該從豪華裝修的樓房是否用高級進口瓷磚，轉移到衛生間是否衛生、飲用水是否乾淨；我們的意識，也許應該從只顧個人先富起來、不惜犧牲多數人，改為看到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人際關係層層互扣，一小部分人患病或發難，社會整體不能持續；要談“發展”、“進步”，不可能不關顧社會底層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

固然，不是發生一次“非典”，我們便有勇氣直面或改變我們的生存選擇。但是，如果我們不願繼續在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之中自食偏狹“現代化”的惡果，那麼，我們便要反思：我們要怎樣的生活，我們如何另闢蹊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朋友，與我一道考察喀拉拉邦，每一天她都重複一句話：他們的衛生間多麼乾淨！回國後隔了一段時間，我們再聚，她念念不忘的，仍是喀邦簡樸居所不顯眼角落裡的衛生間。

的確，在喀邦，每到一處，無論是小學校、鄉公所、農戶家，衛生間都是乾乾淨淨的。見微知著，我便明白，喀邦人均國民收入只有三百美元（人民幣二千四百元），美國人均國民收入比喀邦高 120 倍，中國高 3 倍，印度全國平均也比喀邦高 10%，可是，喀邦的男女識字率就是 95% 以上，男女平均壽命就是超過 70 歲，嬰兒死亡率就是低於千份之 17。

社會總體對衛生重視，不僅是資源調配的問題，也是多數人抱有什麼價值觀，並且能否通過參與來實現或修改其願望的問題。

1996 年喀邦推行“人民計畫運動”，邦政府把全部財政預算的五分之一撥給鄉村自治的主體——鄉議會——直接使用。昆那杜卡鄉 Kunnathukal 的勞動力銀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很能說明衛生間的故事。

2000 年，“人民計畫運動”如火如荼開展，我在炎夏到昆鄉考察勞動力銀行。甫下車，便看到幾十名婦女手拿紙牌，興高采烈地遊行，宣傳她們參與的項目——勞動力銀行。這裡，勞動力銀行的參與者，四成是女性。自從實行“人民計畫運

動”之後，昆鄉每年獲“計畫發展基金”直接撥款 750 萬盧比，相等于人民幣 136 萬元（以下均以人民幣折算）。政府的政策規定基金的撥款起碼有百分之十要用在婦女項目上面；其他鄉有些把建衛生間也算作婦女項目，說婦女也要如廁，但這裡，據鄉議會的人說，他們不賴帳，其中一個婦女專案是把全鄉建衛生間的水泥匠工程承包給一個婦女組，讓 35 人(年齡 28—46 歲)接受 40 日培訓，培訓期間每天工資 10 元，之後工匠工資 30 元。這 35 人裡面，20 人是勞動力銀行成員。我好奇問，甚麼是勞動力銀行？解釋是，該鄉有個怪圈現象，農忙期間缺人手，要從外鄉雇人，因為本鄉人找不到工作大都往外跑。“人民計畫運動”開展以後，由於有了直接撥款，鄉民自治組織有一定經濟底子，以往由承建商承包的政府工程，現在都由勞動力銀行承包。鄉民在銀行登記，可獲保證每月有 20 天工作，每天一般有 22 元工資；雇主可獲保證勞動力供應，銀行甚至會協助預支勞工工資，也為勞工集體購買勞動保險。參與勞動力銀行的勞工，有 225 人是全職的(其中四分一是女性)，有 375 人是兼職的(其中一半是女性)。在勞動力銀行存款 30 元，就可以成為成員。勞動力銀行有資金 42 萬元，從事的大都是農業發展(例如鼓勵有機耕作、合作耕作)以及鄉村工程(例如挖井、建房)。

穿著傳統印度沙麗衣著的准水泥工匠，帶我看她們接受培訓的工地。烈日之下，無疑這是粗重的工作，但是，這份工作帶來的自尊和自信，又豈僅是經濟意義上的一技之長？

無可否認，社會上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貪污腐敗、低效率等等，不是一次運動可以改變過來的。但是，當“人民計畫運動”發動全民由下而上自願參與時，民眾可以利用政府政策創造的空間，逐步落實對民眾有利的做法。以勞動力銀行為例，鄉民同意撥款優先為每家每戶建衛生間，而這項工程不交給大承建商，卻為婦女水泥匠“專利”，這就既提高了婦女地位，又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又減少承建商的貪污和牟利，一舉多得。為了減輕機構臃腫，勞動力銀行架構精簡，只有三名農業主任，三名建築主任，一名義務秘書，兩名文職人員。

勞動力銀行不過是一例。在人口三千萬人的喀邦，運動頭兩年興建了 24 萬個衛生間，可見鄉民一般重視衛生。婦女專案也在政府推動下熱鬧展開。在泰裡索 Trichur，兩年內培訓了一百名女司機，駕駛小摩托的士；以前，只有 4-5 名女司機。在一個婦女騎自行車也會受非議的地方，婦女拋頭露面駕駛小摩的，可算是一場社會小革命。婦女更開辦空手道班，練習自衛術，一改弱不禁風的女性形象。研討性別問題的研習班，竟有幾名男士參加。我訪問的年青男子哥平納 V.G.Gopinath 是“人民計畫運動”泰裡索的地區主任(該區轄下有 98 個鄉)，他說，泰裡索區是“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多年耕耘基層工作做得不錯的地方，婦女專案也走在前沿。

與多位朋友交談，幾乎都異口同聲認為喀邦的性別關係必須改善，也認為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非朝夕可改。但是，他們寄厚望於“人民計畫運動”推動的婦女互

助組織的發展。喀邦計畫委員會策劃這場運動的核心人物艾塞克 Thomas Isaac，指出以往喀邦只有 15% 婦女就業，但在開展“人民計畫運動”之後，基層組織活躍參與的大都是女性。他說，婦女是運動的骨幹，學習能力高，主動性強；男性則必須學習把過去習慣的一套丟棄，這個殊不容易。邦計委安排了全面的婦女現況調查和婦女培訓專案，一年內，有一千人接受 14 日培訓，五千人接受 10 日培訓，十萬人接受 4 日培訓，五十萬人參加了一天會議。此外，是鼓勵婦女互助組成立，並組成全邦聯網。艾塞克說，婦女互助組聯網是“人民計畫運動”的得意之作。

走訪了幾個婦女互助組，有做椰油肥皂的，有做糕餅的。肥皂賣 1 元 5 毛，糕餅賣 3 毛 5 分，小組成員每天工作四至五小時，收入 2 元。婦女互助組採用儲金會形式，會員月供約 20 元，輪流借貸做小生意、修房，甚至為女兒辦嫁妝。做糕餅的婦女，自豪地說小組已儲蓄 1 萬元，大家打算買一部摩托車，好把糕餅銷售網擴大。“誰是司機？”“當然是我們啦！”

婦女從無償家務勞動走向有償勞動，學習會計、分工、經營、新技術，還有處理人事糾紛。小組自訂的規則很精細，例如遲到十分鐘罰款 2 毛，三次缺席，所有組員便移師到缺席組員家裡開會，因為當地習俗是誰家有客，要用甜茶糕點招待。這些變化在全村婦女中間發生，產生的文化衝擊不可小覷。

鄉議會之下設有村自治組，成年人數目約一千。每年舉行四次的村自治組全民大會是全民參與的直接民主機制，全權決定撥款用在甚麼專案上。我旁聽了兩個村自治組全民大會，有水利專家講解水流域，有女學者講解婦女參與問題，然後分組討論專案建議。出席者百分之七十是婦女，儘管踴躍的發言者還是男性。

多位被訪者不約而同指出，這個大量基層婦女積極參與的現象，不僅是女性自強和改變處境，也引入基層民主景觀的變化。

運動的反對者也不少，尤其是私人承建商和政府官僚。前者獲得的工程大幅減少，經濟利益受損；後者要從一貫的向上級負責的作風，改為向鄉自治組織負責，覺得難以適應。追問席捲全邦的這場運動較深遠的影響是甚麼，有趣的是，許多人的回答，都與貪污腐敗有關。政府規定所有與這場運動有關的文件要公開，所有專案收支要明列，受益人名單要公佈，公眾可隨時翻閱，違例官員要懲處。許多人說，積重的沈疴--貪污腐敗--是印度社會長期以來一大特色，這次運動不可能一下子使社會清廉，但能讓貪污腐敗現形，通過民眾的參與、決定、監管，約制貪污腐敗。

從興建衛生間到建立社會清廉，喀邦民眾繼續在實踐中學習。在他們心中醞釀茁壯的，是承擔積極參與的責任的主動能力；過去積壓在心中對現狀的憤懣和無奈，也隨著減退。注重乾淨衛生間的建設，看似微不足道，蘊含的卻是身心健康的大義。